

西方政治思想译丛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李强 主编

贸易的猜忌

历史视角下的国际竞争与民族国家

[英国]伊斯特凡·洪特 著

Istvan Hont

霍伟岸 迟洪涛 徐至德 译

译林出版社

西方政治思想译丛

贸易的猜忌

历史视角下的国际竞争与民族国家

[英国]伊斯特凡·洪特 著

霍伟岸 迟洪涛 徐至德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贸易的猜忌: 历史视角下的国际竞争与民族国家 / (英)
伊斯特凡·洪特 (Istvan Hont) 著; 霍伟岸, 迟洪涛, 徐至德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 12
(西方政治思想译丛)
书名原文: Jealousy of Trad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the
Nation-Stat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SBN 978-7-5447-6799-6

I. ①贸… II. ①伊… ②霍… ③迟… ④徐… III. ①国际
贸易—研究 IV. ① F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16206 号

Jealousy of Trad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the Nation-Stat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y Istvan Hont
Copyright © 2005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6-634 号

贸易的猜忌: 历史视角下的国际竞争与民族国家 [英国] 伊斯特凡·洪特 / 著
霍伟岸 迟洪涛 徐至德 / 译

责任编辑 陈 锐
责任印制 单 莉

原文出版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34.5
插 页 2
字 数 479千
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799-6
定 价 8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订购热线: 025-86633278 质量热线: 025-83658316

丛书序言

自东汉末年佛教东传,梵客华僧,络绎于途,翻梵为秦,流布天下,极大地促进了华夏文明的发展。前贤移译异域经典的努力,不仅令后人敬仰,也为我们留下不灭的典型。

近世海通以降,特别是晚近二三十年来,译介西方政治理论的著作已经蔚成风气,但近来学界翻译的选目,却多偏重于当代作品。此中似乎隐含着这样一些理据:其一,当代理论关注现实问题,往往有较高知名度,读者会更加认同。其二,自进化论在近代传入中国后,国人对“进步”的观念坚信不移,认定新学问必然代表知识进化的更高阶段,包含更高、更全面的真理。但是,这种厚今薄古、贵近贱远的倾向,往往会忽略政治理论中一些最深层的问题。

所谓政治理论,在本质上就是关于秩序的理论。人类秩序之构建至少必须处理三方面的问题。第一,认同问题,涉及个体与群体、群体之间、人类与超越价值之间的关系等;第二,政治制度问题,涵盖诸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统治权威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政府内部之结构功能与运作等;第三,公共政策问题,涉及政府在具体问题上的政策原则、目标及实施程序等。若如此理解政治理论,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视界便显得颇为狭窄。当代西方社会由于基本完成了制度构建的历史使命,认同问题似乎也不构成困扰他们的主要问题,故而其政治理论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公共政策

方面,即探讨“谁应该得到什么”的问题。假如这样一种狭窄的理论视角构成汉语学界心目中西方政治理论的景象,恐怕无法真正理解西方现代政治的构建原则,无法理解现代政治秩序形成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对我们思考中国问题难以提供有意义的启迪。

为了弥补国内政治理论翻译中的这些缺憾,使读者对西方政治理论的历史演进与复杂内涵有更全面的理解,这套丛书希望从理论、历史、制度相结合的视角,选择译介西方政治理论中的重要著作。丛书关注的重点是政治思想,但在考察思想时,更加注重历史与制度的视角。它强调将政治理论放在历史的情境中理解,考察理论得以产生的背景及试图解决的问题;它关注历史的多样性与理论的复杂性,而不试图仅仅以理性为基础抽象出亘古不变的政治原则。它在历史考察中强调理论与制度的结合,既关注一个时代政治制度的结构,又力图展示重要思想家对当时制度的理论思考,从制度与理论结合的视角探索西方现代政治的历史演化轨迹以及隐含的原则。

我国中古时代,人们对于移译佛教经典,曾经有经、律、论三藏何者为先的讨论。晚近提倡阅读西方经典原著也成为一时潮流。然而,对于这些来自异域殊方的原典,如果缺乏历史语境的背景知识,难免望文生义,难解真义。有鉴于此,我们这套丛书,也将精选一些重要的二手研究著作,以促进读书界对于原典的真正理解。

译丛之设,已有很多。这里略述编辑旨趣,求其友声。究极而言,是为了假自他之耀,更全面地展示西方政治发展与思考的全貌,为国人思考政治问题尽绵薄之力。

献给安茜



国家理性是有歧义的。在滕佩斯塔的这幅铜版画中，鹰头的罗马士兵在给谨慎的统治者提供帮助，却对王国流露出野心，伸手去拿象征平民权力的权仗，而衔尾蛇则象征着永恒和地球。

中文版导言

1977年9月29日伊斯特凡·洪特向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申请“社会与政治经济学：1750—1850”项目的经济或社会理论研究员职位。¹ 他的申请信非常引人注目，因为这封信清楚地表明，洪特已经构想出日后使他声名鹊起的那种政治思想研究取向。当时他已离开共产党统治的匈牙利，正在牛津大学从事对大卫·休谟的研究，其导师是时任钦定皇家历史讲座教授的休·特雷弗—罗珀。特雷弗—罗珀像每一位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成长起来的那一代历史学家一样，曾经被马克思主义和使历史成为一门科学的承诺所吸引。到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他已经十分肯定，在欧洲日益占据主导性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取向正在阻碍着学术研究，他相信观念与经济力量同样重要，经济发展与意识形态发展之间的关系从来都是不可预测的。² 到20世纪70年代，特雷弗—罗珀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之一，他还是一位声誉卓著的散文家和社会评论家。然而，洪特的申请信表明，他的研究取向完全是其在布达佩斯大学研究工作的产物。他在布达佩斯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是“大卫·休谟与苏格兰”，指导教师是埃娃·鲍拉日教授。

洪特在申请信中解释说，从他在布达佩斯大学做本科生开始，他就一直

1 洪特给大卫·帕里的信，1977年9月29日，伊斯特凡·洪特文稿，圣安德鲁斯大学特藏。

2 Adam Sisman, *Hugh Trevor-Roper. The Biography* (London: Phoenix, 2011), 202; 特雷弗—罗珀写道：“马克思主义一直是历史研究的伟大激励，但现在它已经屈服于知识硬化症。”

对“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解的认识论问题”感兴趣。由此,洪特从他在匈牙利所受的教育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历史研究取向中发现了一个悖论。洪特说,由东欧集团国家的历史学家们所作的历史研究缺乏“任何明确的理论”。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支持苏联体系的哲学家们却在生产着历史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在概念能力上可能是了不起的,但不能启发历史研究;更确切地说,这些理论“实际上取代了历史探究本身”。洪特的结论是,写作“哲学史”是极端重要的,但这只能通过“概念严谨但严格的历史研究”来实现。洪特的主要主张是,这种研究的最好向导必须是这样一些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们还没有被迫将经验研究与理论相分离,事实上他们必须拒绝任何关于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可相分离的假设。洪特说,正是在18世纪,在欧洲处于被称为启蒙时代的那个时期,恰好可以找到他感兴趣的那种哲学。大卫·休谟、亚当·弗格森、亚当·斯密、威廉·罗伯逊和约翰·米勒是作出了一系列关于经济发展的杰出研究的领先学者,这些研究是才华横溢的,因为它们严肃对待了任何关于经济行动之主张的历史特性,并且承认除了有对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经济限制之外,还有对经济创新的政治限制。生命和历史的特征是,把总是具有非意图后果的改革、改善或生存策略付诸实践。一种聚焦于当下问题的哲学史必须承认这些关于人类世界的事实。在接下来的二十五年里,洪特努力把这种取向应用于研究17世纪以降欧洲社会就提出来的那些政治和经济问题。最终成果就是他的鸿篇巨制:《贸易的猜忌》。

《贸易的猜忌》解释说,20世纪的政治理论是有缺陷的,因为其信奉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思想传统,这两种思想传统都依赖于“隧道历史”(tunnel histories),也就是用来证明这两种思想传统之正当性的历史叙事。这些隧道历史是错误的,因为它们没能处理经济的政治化问题。从17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开始,经济的政治化已经改造了智识生活,并且在18世纪导致了一系列关于政治与经济之关系的卓越研究。洪特的观点是,学者们由于法国大革命结束后衍生的那些腐化的意识形态,已经失去了理解18世纪思想的能力。在《贸易的猜忌》中,洪特描述了那场关于政治对经济的控制和经济对政治的控制之间关系的论争,这场论争是从大卫·休谟试图驳斥伯纳德·曼德维尔的商业社会观开始的。洪特为思想史家列出的议题奠基于下述观点:要理解现

代政治,霍布斯或马克思都不可靠。事实上,这两人对哲学家和史学家所产生的压倒性影响已经损害了几代人的学术研究。对洪特来说,霍布斯只是部分“现代的”,因为他并未充分地分析商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洪特称霍布斯是最后的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之一,理由是“在他的政治学中,经济没有任何重要意义”。正如洪特所言,霍布斯的思想“实际上纯然是政治学”。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可以发现相反的问题。马克思曾试图完全取消政治,用“一种清除了私有财产及其政治护卫者(国家)的扭曲性影响的、真正人类效用的纯粹交换经济”来取代政治。这样一种热望是不切实际的。此外,试图取消政治不可避免地就会带来整个社会更多的自由丧失。洪特说,当下令人担忧的两大问题是:经济是否可以独立于政治而得到审视;抑或是否由于“现代代议制共和国……对市场有一种选择性亲和”,所以经济与政治是以复杂的方式互相关联的?处理这样的问题要求我们回到那些其“分析深度”从未被超越的思想家——休谟和斯密,因为他们“对未来,即一个由竞争性商业国家组成的全球市场的看法……仍然应当得到我们的注意”。

洪特承认,波考克在《马基雅维里时刻》(普林斯顿,1975年)中重构了共和主义对市场的批评是重要的,在波考克的叙述中,贸易的猜忌被看作战争和国际对抗的肇因。他接受波考克的观点,即自然法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在把共和主义观念与好战性联系起来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好战性创造了各种形式的“国家猜忌”,而如果要实现和平,就需要将好战性从政治生活中移除。洪特的新洞见在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共和主义和商业现代性,也“主要在关于国家荣耀的共和主义学说与关于全球市场的现代政治学之间”发展出了重要的政治协同作用。当国家理性以贸易猜忌的形式被应用于国际贸易时,当由它所引起的自我防卫感与共和主义的爱国主义相叠加时,它就证明了针对欧洲以外国家的帝国主义意图的正当性,并导致了对外经济扩张。当国家理性与共和主义的爱国主义被应用于欧洲内部的国家间贸易时,一些形式非常不同的国家政治就产生了,因为为反对“垄断者”的战争进行辩护的正当理由被广为使用,而且使摧毁邻国的贸易成为必需的经济实践(一个经典案例是大不列颠对爱尔兰的所作所为)也变得司空见惯。一个比之前远为不安全的世界诞生了,而关于这个世界的思想史,特别是关于政治学与政治经济学之关

系的思想史,才刚刚开始谱写。洪特感兴趣的是,国家理性以何种方式损害了以德性为基础的政治取向,从而产生了一个由民族主义、重商主义、种族中心主义和致力于阻止人民像政治主体一样行动的虚假民主所构成的世界。这就是启蒙的阴暗面。

从这个视角看待历史,使洪特建议“抛弃 19 和 20 世纪的概念包袱”,拒绝在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走第三条道路的观念,并且对现代性的观念采取了一种不信任的态度。洪特确知,很多思想史继续以“实用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方式被书写。³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已经发现辉格式的历史解释支持了英国的民族主义。辉格历史学家们把新事物的创造伪装得好像是旧有之物,结果确立了一种“虚假的历史意识”。对洪特来说,关于发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剑桥学派思想史的关键事实是,它试图进一步推进巴特菲尔德的使命。它通过两条路径来实现这一点。首先是通过波考克关于马基雅维里之影响的论著。洪特把英国的马基雅维里主义称为“辉格历史解释的传承话语”,并且强调了这两位学者之间的联系。毫无疑问,波考克确实是在巴特菲尔德的指导下于 1952 年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业。在洪特看来,剑桥学派值得一提的第二个分支是邓肯·福布斯的著作。福布斯的《休谟的哲学政治学》(1975)以卓越的细节分析表明了休谟对“庸俗的辉格式”主张——新教与反抗建立了英国的自由——的拒斥。毋宁说,在休谟的“怀疑论的辉格叙事”中,公民自由是一切形式自由的基础,它反过来又依赖于财产的安全,并且是通过贸易的逐步增长而建立起来的。并不存在最初的撒克逊人的自由,公民自由不以先引入政治自由为先决条件。对休谟来说,不重复 17 世纪的英国内战而在全欧洲引入公民自由是可能的。洪特把他自己的著作看作是,以修正“福布斯对政治经济学的忽视”的方式把福布斯的解释推向前进。在休谟提出他的观点之后,从商业中来解释现代自由的起源正是亚当·斯密的成就,当然,斯密对现代自由起源的解释要比休谟的解释清晰明确得多。对斯密而言,奢侈生活既削弱了罗马帝国,也削弱了封建时代欧洲的政治体。然而,当罗马帝国

³ Hont, “The Cambridge Moment: Virtue, History and Public Philosophy”, 未刊讲座, 2005 年 12 月 11—13 日, 千叶大学(Chiba University): 洪特文稿, 圣安德鲁斯大学特藏。

崩溃后,一些致力于商业的罗马帝国的城市却存活了下来,并且保持了它们长久以来就已开辟的通往东方的贸易路线。正是大型君主国的封建精英沉迷于东方世界供给的奢侈消费,才削弱了他们的社会和政治权力。根据洪特的重述,斯密认为,文艺复兴的共和主义并非欧洲自由的源头。意大利诸城市在经济上得到了发展,结果促进了自治的贵族政体,但这仅仅是因为它们十字军东征期间为欧洲君主国提供了给养。在政治自由与作为当代欧洲生活之标志的更为形式多样的自由之间没有什么关系。正如洪特所言,斯密同意“政治和商业行动者总是追求短期利益,而没能看到长期的后果”。商业的兴起仅仅是因为战争的经济需要创造了珍视公民自由的军事精英。公民自由在全欧洲的扩散“是奢侈和战争共同作用的结果”。

对斯密而言,欧洲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以洪特所谓的“倒序”发生的。换句话说,它始于在罗马人统治时期就已经十分繁荣的奢侈品远途贸易,随后国内贸易才逐渐发展起来,直到最后农业才变得商业化。众所周知,斯密反对重农主义和流行的或曰重商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战略,后两者在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是老生常谈。洪特认为,斯密《国富论》的伟大成就是设计了“一种无需推翻欧洲的经济和政治独特性的经济改革战略。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是面向所有后来人对公民自由及其独特的欧洲经济先决条件作出的一个伟大的——也许是最伟大的——辩护”。斯密像休谟一样,努力摧毁人们的一些相关错误观念——欧洲自由史以及它与古代自由传统或各种现代形式的政治自由之关联的假定。⁴ 在洪特看来,当历史学家们致力于特定的立场时,无法避免目的论的隧道历史就发展起来了。他的意思是,当思想史家信奉共和主义或自然法作为欧洲自由发展叙事里最重要的推动力时,隧道历史就出现了。从洪特的视角来看,20世纪70年代在剑桥发生的事情可以被描述为一个“反学派”的形成,把一群具有相当多元化取向的学者聚集在一起,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对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施特劳斯学派

4 关于洪特的这一论证,参见他的“Adam Smith's history of law and government as political theory” in Richard Bourke and Raymond Geuss, eds., *Political Judgement. Essays for John Dun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and in *Politics in Commercial Society. Jean-Jacques Rousseau and Adam Smit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和后现代的历史研究取向持怀疑态度。任何人只要意识到当代的意识形态没能理解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关系,意识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只能通过思想史研究才能被发现,都可以被称为这个“反学派”的一员。

洪特以超出任何一个同时代人的雄心,来捍卫一种看待思想史的观点。他把思想史描述为唯一能够评估各种现代意识形态,通过历史分析来展现其优势和不足的至关重要的学科。当洪特说 19 和 20 世纪在政治观念上只是“二流的”,他并不全是在开玩笑。要理解现代政治,就必须仔细考察“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依赖最初开始成为政治理论核心议题的那个时期”。洪特在《贸易的猜忌》中的目标就是要回到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因为通过重构他们的政治学,而无需参照当代意识形态,我们就有可能“在 18 世纪的国际市场竞争理论中发现政治上的洞见,而这对于 21 世纪仍旧是有意义的”。这就是思想史的任务,它最大的用处就在于它“揭示了困境的真相,并且使我们无需陷入重复性的争论之中”。洪特的《贸易的猜忌》明确“提供了这样一种历史,眼光紧紧锁定于当代的种种挑战”。

贝拉·考波希(洛桑大学)

理查德·沃特莫尔(圣安德鲁斯大学)

致 谢

《贸易的猜忌》各章节最初发表于1983年至1994年间,几乎没有读者看过或读过所有的章节。在取向和主题上,它们是契合在一起的。我要感谢哈佛大学出版社,感谢本书的编辑迈克尔·阿伦森,感谢两位匿名评审人,他们鼓励我把这些文章结成一册,并加上一个新的导论重新出版。虽然我作了一些调整来增加可读性,但是这些研究的重印是未经实质性修改的。一些事实性错误得到了更正,参考文献统一了形式,所有书目都已更新为最新的和最常用的版本。原来出现在每一章的致谢业已合在一起。

本书源于我在布达佩斯大学的博士论文,以及我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研究中心和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共同指导的题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1750—1850”的一个研究项目。书中的章节写于我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爱丁堡大学人文高等研究所、哥廷根马克斯·普朗克历史研究所和匈牙利布达佩斯学院高等研究所期间。在进行本书研究的同时,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剑桥大学分别讲授政治学和历史学。在哈佛大学的时候,我开始撰写本书的导论,并在剑桥大学完成了它,这都得益于一项为期三年的利弗休姆高级研究奖金。我要感谢所有这些机构对我的慷慨资助。

在本书的长期酝酿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的襄助。我在布达佩斯的博士生导师埃娃·H.鲍拉日和牛津大学的导师休·特雷弗一罗珀,都对我照顾有加。在匈牙利,阿拉达尔·马达拉兹是唯一欣赏并理解我这项始于博士论文的工作的人。当我在匈牙利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时,欧文·帕姆兰伊是一

- ix 位和蔼可亲的部门领导。聪明而慷慨的 M. M. 波斯坦帮助我留在了英国。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的董事们不可思议地支持给我在英国的第一个学术职位。从一开始,克里斯托弗·古迪就指点我如何直率地思考并坚持到底。约翰·罗伯逊一直是我在牛津大学的挚友和同僚。国王学院的院长和同事们多年来对我极其友善,国王学院研究中心在院长伯纳德·威廉姆斯的领导下臻于鼎盛,我能受雇于此,感到非常幸运。在国王学院,我有幸能和约翰·邓恩、加雷斯·斯泰德曼·琼斯、迈克尔·邹楠莘、乔纳森·蔡特林、罗斯·哈里森、安东尼·帕登和爱玛·罗思柴尔德一起共事。我的朋友约翰·邓恩常常给予我出于一切义务感之外的鼓励和建议。迈克尔·邹楠莘给我提供了宝贵的学术资源和深情厚谊。加雷斯·斯泰德曼·琼斯总是给予我坚定的支持。我极大地受惠于邓肯·福布斯的严谨智慧,有了他的帮助,我最终——这也让我大吃一惊——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致力于18世纪政治思想的大学教职上取得了成功。理查德·塔克的创造性和雅思妙想让我受益匪浅。我还受益于这个领域内一些资深学者的友好支持和智识上的慨然大度。他们包括:J. G. A. 波考克、莱因哈德·科泽勒克、昆廷·斯金纳、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梅尔文·里克特、J. H. 伯恩斯、霍斯特·德赖策、唐纳德·温奇、E. J. 亨德特、罗杰·埃默森和菲亚梅塔·帕拉蒂尼以及其他学者。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艾伯特·赫希曼、迈克尔·沃尔泽以及约翰·埃利奥特给了我宝贵的建议。在哥伦比亚大学,朱利安·富兰克林的聪明才智让我受益良多。我非常享受同弗雷德里克·斯莫勒、阿伦·西尔弗、劳伦斯·迪基与马拉奇·哈科恩进行的富有成效的交流。雷蒙德·戈伊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剑桥大学都是恪守最高学术道德的典范,他教会我如何简明地思考和写作。我不论何时遇到帕斯奎尔·帕斯奎诺,他都是一个出色的智识上的论辩对手。在芝加哥,斯蒂芬·霍姆斯是激发我灵感的人;在哥廷根,是汉斯·埃里希·博德科尔;在爱丁堡,是尼古拉斯·菲利普森;在鹿特丹,是汉斯·布洛姆;在维也纳,是迈克尔·兰德斯曼;在佛罗伦萨,是马克·米内尔比;在蒙特利尔,是詹姆斯·摩尔;在纽约,是弗雷德里克·斯莫勒;而最近,是皮特·米勒。我要感谢基斯·特赖布、罗伯特·沃克勒、格雷戈里·克拉埃斯、托马斯·马斯特纳克、苏珊·詹姆斯、西尔瓦纳·托马塞利、卞卡马利亚·丰塔纳、理查德·
- x

乌特莫尔、理查德·伯克以及露丝·斯库尔这么多年来给予我的支持。在我最近造访哈佛大学的时候,受到了理查德·塔克、迈克尔·桑德尔、小哈维·曼斯菲尔德的热情款待。在政府系,普拉塔普·梅赫塔、格林·摩根和罗素·缪尔黑德,都是不可多得的智识伙伴。伊萨克·纳吉莫夫斯基、马克·绍莫什、奈杰尔·德·索萨、泽埃夫·埃梅里希、保罗·罗森贝格、邓肯·贝尔、安德鲁·库珀、伊娃·皮里梅、安德烈·圣乔瓦尼、安妮·斯蒂利兹以及其他人在我写导论的数稿时,提出了有益的批评意见。我尤其感激贝拉·卡帕希在剑桥和洛桑与我所做的交流。

安娜·洛瓦斯对我的情义是无与伦比的。她的耐心、和蔼以及无私的爱,支撑我完成了这一整本书的写作。这本书是献给她的。

每一章首次发表如下:

第一章

最初是以“社会性语言与商业:塞缪尔·普芬多夫与‘四阶段’论的理论基础”为题,发表于A.佩格登主编的《现代早期欧洲政治理论的语言》(*Languages of Political Theor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53—276)。承蒙编辑和出版商的许可在此重新发表。

第二章

最初是以“自由贸易与国家政治的经济限制:重新思考新马基雅维里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题,于1986年在新奥尔良的杜兰大学墨菲政治经济学与政策分析研究所的“政治的经济限制”系列讲座上演讲。首次发表于约翰·邓恩主编的《政治的经济限制》(*The Economic Limits to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41—120)。承蒙编辑和出版商的许可在此重印。

第三章

最初是以“苏格兰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富国—穷国’之辩”为题,为1979

年国王学院研究中心举办的“公民人文主义与苏格兰政治经济学的开端”学术研讨会准备的,首次发表于本人与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主编的《财富与德性:苏格兰启蒙运动中政治经济学的形成》(*Wealth and Virtue: The Shaping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271—316)。承蒙出版商的许可在此重印。

第四章

最初是以“国债狂想曲:大卫·休谟与自愿性国家破产”为题,首次发表于尼古拉斯·菲利普森和昆廷·斯金纳主编的《现代早期英国的政治话语》(*Political Discourse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321—348)。承蒙编辑和出版商的许可在此重新发表。

第五章

最初是以“‘非自然与倒退’次序的政治经济学:亚当·斯密与自然自由”为题,为1988年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的卡尔·马克思出版社研究中心举办的“法国大革命与政治经济学”研讨会准备的,首次发表于《法国大革命与政治经济学》(*Französische Revolution und Politische Ökonomie*, Schriften aus dem Karl-Marx-Haus, vol. 41. Trier: Friedrich-Ebert-Stiftung, 1989, pp. 122—149)。承蒙出版商的许可在此重新发表。

第六章

最初是以“《国富论》中的需要与正义:导论”为题,由本人与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合作撰写,首次发表于本人与伊格纳季耶夫主编的《财富与德性》(*Wealth and Virtu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44)。承蒙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和出版商的许可在此重新发表。

第七章

最初是以“人类分裂的恒久危机:历史视角下的‘当代民族国家的危